

论王蒙文化心态中的革命认同

孙晓文

(淮南师范学院 中文系, 淮南 232001)

[摘要] 由于历史、意识形态和青春期的原因, 王蒙早年选择成为革命知识分子, 树立了坚定的理想主义, 以后的政治运动曾一度使其心态失衡, 身份认同产生过迷失, 但坚定的革命认同始终在他身上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 成为他创作的整体精神之根。

[关键词] 王蒙; 知识分子; 革命认同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054 (2008) 01-0053-05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追随、投身革命的光荣传统。青年学生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 看到了民族觉醒、重塑灵魂的现实力量, 革命摧枯拉朽、扭转乾坤的勇猛气势, 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安排和承诺, 对他们无疑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40 年代末, 中国思想活跃的青年学生都倾向左翼, 倾向革命。北平解放时, 正上高中的王蒙就已经是党的地下组织成员, 不久又被培养任用, 从事团的工作。青春年少的王蒙, 胸中埋藏的最高理想就是作一个“职业革命家”。从心理学角度来看, 个人生命周期中的青少年阶段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表现在身份认同定型后很难变更。对革命最初的、积极的、坚定的认同, 在王蒙身上打下不可磨灭的火的烙印。

一

当时正值青春年华的王蒙身上鲜明地体现出对“革命”强烈、自发的认同。革命既是某种崇高的理念, 如“忧国忧民、慷慨悲歌、大公无私、为了民族和阶级的解放甘愿背十字架”, 也具体表现为富有感染力的激情, 比如说在偶然情形下发现同龄伙伴居然是“自己人”的惊喜之情: “今天, 在这个历史转折的时刻, 在即将属

于人民所有的城市的街头邂逅, 而且各自带着一支队伍——这说明了他们的即将公开的政治身份, 两个人脸上都显出了明朗的、会心的笑容, 一种比爹娘、比兄弟姐妹还亲的革命感情暖热了他们的心胸。‘天亮了!’ 钟亦成向凌雪扬起手, 喊道。”^{[1](185)} 这是小说《布礼》中男女主人公“石桥相会”的戏剧化场景。当游戏般的战斗取得胜利, 他们还像“大人那样地握了一下手”。凌雪“致以布礼”的问候, 在钟亦成心底激起“黄钟大吕”、“烈火狂飙”、“神圣而又令人满怀喜悦”的情感, 因为“这还是头一次从一个活着的人, 一个和他一样年轻的好同志口里听到它”。这是难以忘怀的关于革命的青春记忆。

当“革命”以成熟、强干、集中了威信和权力的老资格革命者的化身降临时, 尤其具有势不可挡的魅力。解放时正当壮年的张思远就是这样的形象: “他那时二十九岁, 唇边有一圈黑黑的胡髭, 穿一身灰干部服, 胸前和左臂上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标志。在他的目光里、举止里洋溢着一种给人间带来光明、自由和幸福的得胜了的普罗米修斯的神气。”^{[2](190)} 作为革命干部、党的代表, 他以热情澎湃的讲话, 轻易地赢得了女学生们拼命的鼓掌、动人的歌声、激动的泪花, 以及少女海云的

[收稿日期] 2007-10-20

[作者简介] 孙晓文 (1972-), 男, 山东莱州人, 淮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校青年教师科研资助计划项目 (2005jqw096)。

初吻。在小说《布礼》和散文《火热的怀念》中，还出现了更具感召力的革命仪式——盛大而热闹的集会场面。全市上千名党员首次会师，“一下子看到了这么庞大的队伍，堂堂正正地坐在大礼堂里，怎么能让人不欢呼、不惊奇呢？”年轻的钟亦成（王蒙）仿佛从皮筏子登上大轮船，驶到海阔天空的大洋，雄壮的合唱、鲜红的旗帜、领袖的画像，操着各地口音的领导同志大声宣布党的意志、部署和召唤，这些都在充分肯定着他的人生选择，欢迎他的皈依，并为他施行了一次集体见证的“坚信礼”。会议的高潮，是烧饼酱肉、油条麻花、煎饼鸡蛋满天飞，大家笑着喊着，兴高采烈地分享“胜”餐（革命胜利应得的奖赏）。在散会后的鹅毛大雪中，部队首长又给这个年轻人披上崭新的军大衣，让他感到革命集体家庭般的温暖和睦与相亲相爱；美妙的梦想于是也变得触手可及，“共产主义是一定要实现的，世界大同是完全可能的”！这次大会留下了鲜明的难以磨灭的印记，让年轻的革命者时时感觉无比的充实和骄傲，因为他选择的是正确的道路，更坚定了他为之奋斗的崇高信念。

这种积极的认同感，有赖于年轻人从与他有密切关系的社会集体那里获得支持，这些社会集体是：他的阶级、民族和文化。青少年精力充沛、永不满足，最普遍的表现是对运动的渴求。埃里克森认为，“各种社会团体提供许多意识形态前景和生动活泼的运动（跳舞、游戏、游行、示威、骚乱）等仪式化的联合，其目的就是要拴住青少年为它们的历史目标服务”^{[3] (P74)}。在共和国的童年，在每一个盛大的节日，王蒙和他的同辈们行进在游行、阅兵的队伍里，抬着图表和模型向祖国汇报，穿上美丽的衣裳、迈着整齐的步伐接受毛主席检阅，用鲜花、红旗、气球、和平鸽、笑脸和口号表达亿万人民的心声，迸发出书写革命、创造历史的激情。《青春万岁》写到杨蔷云在冰场上飞跑，和张世群展开比赛，“她就觉得自己那小小的身躯，装不下那颗不安分的心，那股烧不完的火。于是她往往激动、焦灼，永远不满足。”“我喜欢的是这样的生活！”^{[4] (P128)}“五一”节之夜，杨蔷云又在大雨中参加天安门组织的舞蹈狂欢，从傍晚跳到深夜，从深夜旋转到天明。王蒙在《国庆的礼花》中说出了当时的

心理感受：“快一点去，快一点站到圈子里，和你周围的男男女女拉起手来吧，我们都是亲人，都是同志，都有共同的欢乐和信念。”^{[5] (P12)}当时的社会集体成功地运用各种途径和手段，动员、组织、培养与弘扬那一代人拥护革命、融入群体、热爱生活。

主流意识形态对青年的积极认同总是许可、鼓励、持欢迎态度的。中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着手将革命的意识形态国家化，同时迫切需要吸收新生力量进行自我巩固和完善。研究者曾经从不同层面对王蒙进行历史定位，刘小枫称他是“四五”一代，何西来将他归入“右派”一代，陈思和则认为王蒙属于“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第四个层次，“50年代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群，思想敏锐，富有理想”^{[6] (P3)}。王蒙这一代人在青少年时期就具有强烈的革命认同，树立了坚定的革命理想，作为革命化的知识分子也得到新中国的高度肯定，成为“革命干部”，或者按照葛兰西的说法变成“有机知识分子”、“专家加政治家”。追求革命、“青春无悔”的情怀自此伴随他们终生，以至30年后中年的王蒙依然有这样的表白：“是的，我们傻过。……然而，毕竟我们还有爱戴、有忠诚、有信任、有追求、有热情、有崇敬也有事业，过去有过，今后，去掉了孩子气，也仍然会留下更坚实更成熟的内核。”^{[1] (P35)}米兰·昆德拉说：青春、革命和诗歌，在本质上三位一体，青春的王蒙与激情的革命历史性地遇合，双双坠入了诗意盎然的热恋。

二

革命认同在王蒙文学创作中的心理投射，首先表现为时隐时现的“战争文化思维”。战争在中国现代思想体系建构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光明黑暗、前进/倒退、胜利/失败、英雄/叛徒、劳动人民/资本家反动派……非此即彼的战时思维，将辩证统一简单化为两极对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知识青年的世界观、人生观。在这样的观念笼罩下，王蒙构思了“大义灭亲”的故事《小豆儿》。小豆儿的爸爸在旧军队里干过，解放后不走正路，刁钻欺诈（倒腾银元、拉房纤、收粘米面、卖再生皮鞋），又跟私藏小手枪的反革命“叔叔”接上了头。团员小豆儿聪明机警，教育

红领巾弟弟对付坏人要象弄死害虫一样，“杀了他”。他们不管妈妈的哭泣阻挠，向派出所揭发了特务。小豆儿终于可以参加她喜爱的赛诗会了，同学们是那么温暖、信任，团总支书记也表扬她“你父亲和你叔叔已经被公安局抓去了，你做得好”，小豆儿心里轻松起来，“比朗诵了一首最好的诗还要愉快”^{[7] (P378)}。《青春万岁》里也有苏宁检举父亲破坏统销、囤积面粉的情节。《恋爱的季节》中，洪无穷在苏红因托派问题被捕后，改名换姓，誓不认贼作母。爱国资本家的儿子李意，为了不被开除党籍，为了女朋友不再跟他“吹”，便向打虎队揭发父亲的“五毒”罪行，母亲因此中风住院他也拒绝探望。《蝴蝶》里的冬冬，在“文革”开始时第一个向父亲张思远抡起了耳光。王蒙还原了那段年代的思想真实，追求革命的年轻人将世间伦理委弃于地时，内心并没有太多的不安与歉疚，“恰恰相反，他们从这种行为中感到了最鲜明、最高尚和最深厚的爱，亦即爱真理、爱正义、爱党和爱革命事业。”^[8]他们以“弑父”的战斗克服了道德焦虑，与旧家庭、宗法血缘关系划清界限，一头扎进了革命的怀抱。在沉痛的历史反思基础上，新时期王蒙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等文，极力倡导一种文明、民主、公正、信赖的人文精神，一种自由、平等、宽容、和谐，富有建设性与人情味的人生态度，以修复阶级斗争的狂热和偏激给革命肌体带来的伤害。

其次，“洁净心态”也是革命认同造成的典型心理特征。王蒙这样回忆共和国的童年：“大家都相信从这一代人起将会过一种全新的、无私的、非常光明美满的生活，我们需要清洗的，只是旧社会残留下来的污垢，而且我们觉得这一种清洗未必比做几次大扫除更困难。”^[9]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讲话》就接过了鲁迅手中的解剖刀，从“社会卫生学”角度重新定义了医生和病人、干净与不洁：“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革命的圣洁化，使具有启蒙精神和自省意识的知识分子更加注重自己与他人的卫生健康，以致养成洁癖。《青春万岁》中的郑波、杨蔷云、吴长福、张世群、田林们，纯洁、质朴、开朗、坦诚，心灵象水晶般

透明。在这个有机地组织起来的学生群体中也存在着“不洁之物”，如被教会反动势力控制愚弄的呼玛丽，童年失贞、家庭落后而性格抑郁软弱的苏宁，骄傲任性、个人奋斗的李春（也曾有过寄人篱下的不幸）。针对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光明的使者们展开了全方位的驱邪治疗：卫生扫除与环境布置（苏宁卧室），团员大会（“吴长福事件”），单独谈心、个别帮助，批评和自我批评，集体吸纳与改变信仰（呼玛丽）。在他们的努力感召下，“病人”们洗净了“脸上的墨点”，治愈了“心里的创伤”，重新成为社会肌体清洁的、有活力的一部分。如果说那时对人的诊治还带有温暖、理解和亲情，以后的发展就逐渐背离了革命的本意：洗澡、挖心、脱裤子割尾巴、脱胎换骨、触及灵魂……知识分子仿佛是带菌的病态的异质，为了革命目标和队伍的纯洁，他们必须一次次躺到无影灯下接受检查，跳进开水里清洗自己。

最后，早年的革命认同还在王蒙作品中凝结成过亮的“光明情怀”。《青春万岁》是在前苏联文学模式下创作的，充满了真善美，洋溢着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它向读者清晰地阐释了一个信念：生活是美好的，前途是光明的。即使又经过十年的风沙销磨，王蒙笔下的知识分子主人公依然心无尘滓，放眼将来，志存高远，精神抖擞：张思远一边择着春天的韭菜，一边充满了转机的预感，“总不能老是一个样子。连小孩子都分得清的是非，党能够弄不清吗？”（《蝴蝶》）曹千里喝够了马奶酒，骑着老马向一片光芒中奔去（《杂色》）。岳之峰走下破烂寒伧的闷罐车，发现“崭新的、清洁的、轻便的”蛮好的火车头（《春之声》）。就连美裔华人蓝佩玉冬游昆明湖，也会生出“叶落以后不一定是冰霜，却可能紧接着蓓蕾和新的嫩芽”的感悟（《相见时难》）。“光明的尾巴”、现代版大团圆的雷同模式，常常将矛盾的最终解决指向社会政治的变迁：冬天过去、春天来临的时序交接体验，放在20世纪40年代末或七八十年代之交无不合适。

三

鲁迅当年曾满腔热忱地高呼：新的应该欢天喜地地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

地地向前走，这便是死^{[10] (P338)}。然而血的事实给他以深刻教训，认清把“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进化论用在人类社会上幼稚虚妄的。而我们在王蒙的部分作品中看到的，是浩劫过后、苦尽甘来的革命知识分子（或革命干部）相信历史将在此划下一个句号，未来无限美好光明。平反后的钟亦成夫妇从党的机关走上钟鼓楼，宣布山可以搬走，海能够填平，三角形内角和必定是一百八十度（《布礼》）。曹千里们坚定地认为，“那些年发生的事情又变成了永不复返（一定！）的‘上辈子’”。（《最宝贵的》）支撑着王蒙和他作品主人公的革命认同的基本逻辑，是一种来自西方、取代了传统“循环史观”的“进化史观”。正如黄子平指出的那样：“时间的圆圈被掐断了，扳成一条箭头向前或向上的直线或螺旋线。‘走向未来’，不再是从历代王朝的兴亡起伏中吸取道德教训并预测新一轮循环中家国的盛衰荣辱，而是向着可望可即的异域模式急起直追；这可见的活生生的‘未来’成为我们评判过去、整理过去、弃绝过去、与过去彻底决裂的强有力依据；最后，大同世界不再是回溯遥远的尧舜虞三代原始的美好记忆，而是朝向一个经过‘科学论证’的辉煌乐园挺进。”^{[11] (P23)}

颇为吊诡的是，按照这种逻辑，当革命也成为历史，未来就不能作为其对立面出现，因为革命是通向未来的。于是未来有义务为革命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做出辩护，现实以未来的名义召唤历史并证明其合法性，却因此阉割、架空了未来，蜕变为“空洞的能指”^{[11] (P31)}。此外，若以革命为历史的常态，以其原则是要“进行到底”的，如果它成为唯一的历史欲望和期待，势必陷入恶性的自我循环：革命，革革命，革革命，革革命……最终取代、吞噬了历史。“文革”中林彪说“这次革命是革我们这些革过命的人的命”。

革命终于将刀锋反转划向自己，让王蒙这些革命知识分子也尝到了苦头。王蒙在“反右”时被错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革命剥夺了他的革命身份，把他推到了革命的对立面，成为革命的“对象”。王蒙的小说多次重现了革命者被“揪出来”初期的不服、委屈、惶恐和疑惑：“你怎么不问问我是什么人呢？怎么不了解了解我的政治历史和现实表现，就把我说成

了这个样子呢？……他这个从儿童时候就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去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作殊死的斗争的孩子，到底是从哪一天起、为了什么、怎样代理起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业务来了呢？”（《布礼》）“这只能是一场噩梦。这是一个误会，是一个差错，简直是在开一个恶狠狠的玩笑。不，他不相信自己会成为党和人民的敌人，不相信自己会落得这样下场。”（《蝴蝶》）

他们欲申辩，立即招来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大字报：要反驳，就被还以“皮带和链条，火和冰，血和盐”；想和革命小将亲热，可在人家眼里只是“一个敌人。一条癞皮狗”；回顾光荣历史，却给当作“彻头彻尾伪造”的“假共产党”；抢险救火、保卫集体财产，换来的仅有严肃的审问和冷冷的警告：“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其实当他们被革命家庭踢出来的时候，已经成了吊销户口、开除身份的“黑人”。失魂落魄的他们只能“认了”：“天昏昏，地黄黄！我是‘分子’！我是敌人！我是叛徒！我是罪犯！我是丑类！我是豺狼！我是恶鬼！我是黄世仁的兄弟、穆仁智的老表，我是杜鲁门、杜勒斯、蒋介石和陈立夫的别动队。不，我实际上起着美蒋特务所起不了的恶劣作用。我就是中国的小纳吉。我应该枪毙，应该乱棍打死，死了也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成了一口粘痰，一撮结核菌……”^{[11] (P31)}“我犯了什么错？！”的灵魂拷问，很快发展成“我是谁？”的身份认同混乱。

恩格斯说过：“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讽刺，免遭这种讽刺的历史活动家为数甚少。”^{[12] (P451)}被“革命”的王蒙一代人还没来得及品咂出“搬石头砸自己脚”的荒唐滋味（如张思远的斗争法术最后施行到自己身上），便带着被革命绝情抛弃的失意，背负着知识分子沉重的原罪感，走向农村、接受洗礼。《圣经》上说，上帝将犯了过错的亚当夫妇赶出伊甸园，去耕种制造他们所使用的原料——土地。王蒙们也试图用体力劳动换回一个公民、一个人的资格，牢记上级领导语重心长的训诫：“只要自己努力改造思想，总有一天还会回到党的队伍。”这是一条放逐—救赎—重

返天国的漫漫长路，对于真正追求革命的知识分子来说，“爱情”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新时期复出的王蒙是以“革命者作家”形象立足文坛的。坚定的革命认同，在他的作品里留下了明显的印迹，即使在政治风雨中颠簸流离、饱尝酸辛，也难改其本色。20世纪80年代初评论家李子云指出，王蒙小说的主要特点仍然是“永远年轻的布尔什维克的心”^{[13] (P35)}。尽管作家委婉地予以否认，但仍然承认“少共精神”是他创作的整体精神之根，并有叹息眼热，泪酬知音之感。十多年后，王蒙对此作了进一步反思：

注释：

- [1] 王蒙. 布礼 [A]. 王蒙选集 [C] (第二卷).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
- [2] 王蒙. 蝴蝶 [A]. 王蒙选集 [C] (第二卷).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
- [3] 埃里克·H·埃里克森. 同一性: 青少年与危机 [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 [4] 王蒙. 青春万岁 [A]. 王蒙选集 [C] (第一卷).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
- [5] 王蒙. 国庆的礼花 [A]. 王蒙选集 [C] (第四卷).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
- [6] 陈思和. 陈思和自选集 [C].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 [7] 王蒙. 小豆儿 [A]. 王蒙选集 [C] (第一卷).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
- [8] 杨. 五十年代的悲喜剧——谈王蒙近作《恋爱的季节》[J]. 当代作家评论, 1993 (2).

“如果你保持充分的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那就没有革命了。革命本身就是一种激情，那是一种信仰主义，坚信革命是正确的。”^[14] 20年后，王蒙仍然坚定地声称：“我的头一个身份是革命者，这一点不含糊。……革命、共产主义是我自己选择的。一个革命者、社会的理想者，在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5] 由于这种革命认同，使得理智上的“告别革命”在感情上难以割舍，知识分子的思考与革命激情的跨时空对话，共同构成了新时期以来王蒙作品里现实与心灵、生活与叙事的矛盾纠缠。

- [9] 王蒙. 谢谢你，爱读《青春万岁》的朋友们 [N]. 山西日报, 1982-04-15.
- [10] 鲁迅. 鲁迅全集 [C] (第一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 [11] 黄子平. “灰阑”中的叙述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 [12] 恩格斯. 致维·伊·查苏利奇 (1885年4月23日) [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C] (第四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13] 李子云. 关于创作的通信 [A].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王蒙专集 [C].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
- [14] 王蒙. 小说的世界 [J]. 小说界, 1996 (2).
- [15] 王蒙. 我只是文化蚯蚓 [N]. 羊城晚报, 2000-07-21.

The Revolutionary Identity in Wang Meng's Cultural Psychology

SUN Xiaowen

(Literature Department, Huainan Normal College, Anhui Huainan 2320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history, ideology and puberty, Wang Meng chose to be a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 in his early years and set up solid idealism. But the political movements in after years made him feel unbalanced and perplexed. The paper uses the theory of Identity to analyze Wang Meng's experience of revolutionary identity and its expression in his works.

Keywords: Wang Meng; intellectual; revolutionary identity

(责任编辑: 陈清茹)